

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 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

李佩雯^{**}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暨社群媒體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共文化理論為框架，試圖理解臺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取徑與傾向。研究者與五個女同志、三個男同志家庭家長進行長期、數次深度訪談後發現，受訪同志家庭嘗試以「堅定自信」、「非堅定自信」與「挑釁」等溝通取徑，預期達到「順應」與「同化」等家庭認同的協商結果。論文指出共文化理論化框架需結合弱勢群體「交織性」及「非典型弱勢身份原型」等概念綜合討論，以強化其理論內涵。研究結果同時反映受訪同志家長的「厚交織」與「交織階序隱形」身份，對於家庭認同協商過程的具體影響。

關鍵字：交織性、共文化理論、同志家庭、家庭認同、認同協商

^{*} 作者欲感謝所有受訪家長的傾心分享，期待拙作能讓你們的故事被聽見。作者也謝謝匿名評審們的專業建議，及國科會研究計畫助理郭柏妤與張福仁的參與付出。

^{**} E-mail: pwlee@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01 月 07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06 月 02 日

家無單一化定義、亦非本質性地存在，而是一種認識、理解的框架和日常生活與他人互動、實踐的過程（謝文宜、曾秀雲，2015，頁4）。

壹、前言

臺灣針對中、老年男、女同志的研究顯示，部分同志在進入穩定或自訂婚姻關係後，與多數異性戀伴侶一樣，都會完成繁衍子嗣的人生任務（王增勇，2011；黃靖雯，2011）。亦有同志在離開異性婚姻後，與同性伴侶組成繼親家庭，共同養育之前在異性戀婚姻中所生之子女（曾嫻融，2013；趙彥寧，2008）。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¹（簡稱同家會）已接觸超過100個透過人工生殖生育子女的同志家庭；截至2020年底，臺灣來自同志家庭的孩子，大約有四百多位（王晴怡，2017；吳少喬，2021）。而國內同性婚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²中，原規定同志婚後僅可收養「伴侶具血緣」的子女，不過2023年5月16日立法院三讀修法通過，同性婚姻關係當事人之一方，可收養他方的子女或「共同收養無血緣」的子女（謝君臨，2023年5月16日）。伴隨著人工生殖科技的日新月異，同志族群不需仰賴先進入異性戀婚姻來完成其生兒育女的人生目標（何思瑩，2014；曾嫻融，同上引），未來國內預計會有更多同志伴侶加入養兒育女的行列。

個人好奇，臺灣的社會文化在法治規定開展同時，是否也能跟進肯認同同志家庭成為社會組成的現實，保障同志家庭免於污名與壓迫，繼而朝向「去異性戀中心」的家庭實踐發展呢？在檢視相關文獻後，發現國外學者們仍少關注學校、職場、教會、政府機構等外界機構，對於同志家庭生活可能造成的權力壓迫（Kuvallanka et al., 2014），諸如對這些非異性戀個人視而不見、對其身分產生歧視，或是不斷強調異性戀家庭才是唯一的正常等，而國內的情況也極類似。

西方的研究指陳，家庭需要透過內在與外在的溝通（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來協商其家庭認同（Galvin, 2006）。家庭認同並非恆固

1 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簡稱「同家會」或「童家慧」，創設於2005年。該會致力於提供同志家庭服務，包括爭取同志家庭的各種權益與親職教育資源。

2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簡稱《748施行法》，為國內的同性婚姻專法。該法由立法院於2019年5月17日三讀通過，同年5月24日生效，使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不變，而是關乎於每一位家庭成員之間共同適應與創造的家庭敘事；家庭認同不僅是一個內部的關係界定，它同時也是家庭成員與外部的社會脈絡及文化期待互動過後，所協商出位處該社會文化下的認同歷程。因此，家庭認同應該是產生與維繫一個群體共享之文化意義的恆動性溝過程（Huisman, 2014）。換言之，家庭認同的形成不會僅限於成員之間的符號互動與辨識，它更是全體家庭成員與外部社會文化系統（如：學校、職場）交流過後所形塑出之意義總和；在這背景下，研究者對同志家庭與外界社會如何透過溝通協商出其非典型的家庭認同產生好奇，並著手探知國內同志伴侶與子女共組的家庭生活樣貌。

貳、文獻探討

一、不夠格家庭？國內同志家庭研究

國內探討同志家庭圖像的學術實證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謝文宜（2006；Shieh, 2010）的一系列同志伴侶研究發現，臺灣的文化過分注重集體價值的家庭主義，同志伴侶間往往因為缺乏社會的肯認，只能依靠兩人不斷在親密關係中彼此承諾，很難進一步論述非傳統「家庭」的概念。劉安真（2017）針對國內外同性伴侶關係的研究強調，同志伴侶的關係品質與穩定度，和異性戀伴侶的相關情況並無差異，甚至在家務分工上，同志伴侶較不受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影響，且在工作分配與生活對待上，相較起來也更為平權。王慧琦等人（2017）的研究亦證實，同志家庭教養出來的孩子與異性戀家庭下成長的子女並無實質上的差異。但上述對於同志伴侶與家庭的調查結果及論述，尚未明顯改變同志伴侶與家庭在社會上相對邊緣化的處境。

同志伴侶經常得面對性少數族群的壓力、內化恐同、出櫃、與原生家庭關係的不確定、缺乏性別角色指引等問題。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簡稱女權會）³（余秋恩等人，2007）的調查指出，不願生養小孩的女同志有 26.7% 的原因是不願讓孩子承受外在社會壓力，而 Giammattei & Green（2012）的研究也指出，欠缺社會支持是同志伴侶遭遇最困難的議題之一，因為伴侶

3 女權會創立於 1994 年 2 月 5 日，當時正值臺灣婦運興起，許多婦女組織紛紛成立。女權會強調婦女權益要根植本土，婦女若遭遇到任何困難，一定要能夠在當地找到支援。因此，女權會從過去到現在，不斷致力於擴大婦女的社區參與，並於 2001 年大力鼓吹在地婦女競選里長（請參見「臺灣女人」網站：<https://women.nmth.gov.tw/>）。

關係難免在發展過程中遭遇不同挑戰，少了社會支持將使得伴侶關係更加困難，甚至導致關係結束。Rostosky & Riggle (2017) 致力於概念化少數群體壓力的來源，他們建議學者在討論同志所面臨的少數族群壓力時，不應該只關注個人層面的議題，而需要探討來自人際、機構（學校、工作組織、教會）、文化（法律、政策、異性戀中心的價值規範）等不同結構層面的外部影響。

同志伴侶與家庭缺乏社會支持多半涉及大眾的同性戀恐懼（恐同，homophobia）、性傾向歧視（heterosexism）、與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等心態與價值體系。此三組概念雖然彼此關聯，卻不盡相同。同性戀恐懼，意指對同性戀者非理性的恐懼與敵意，學者認為「同性戀恐懼」這個語詞僅將社會對同性戀的敵意縮小至個人層次，卻忽略恐同的態度其實是社會文化層次上的壓迫。因此後來學術界開始沿用「性傾向歧視」一詞，以指同性戀所遭遇的制度、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層面的壓迫。「異性戀正典」則是指一套鞏固異性戀以及傳統家庭價值的性別規範，並認定此價值體系是人類唯一正確的生活方式（劉安真，2017）。Oswald et al. (2005) 認為異性戀正典乃是通過社會建構而成，其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干預可分為三個向度：第一，性別角色二分；第二，獨尊異性戀，病理化非異性戀親密關係，反對兒童接受同志教育以及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三，推崇有血緣關係的一父一母家庭為正常家庭，其他的家庭型態都被貶抑為「不正常」或「偏差」。恐同、性傾向歧視、與異性戀正典都可能造成同志伴侶及其家庭與外部社會連結時的困難，其堆疊而成的意識形態讓社會上不同樣貌的多元家庭，為避免遭受攻擊與傷害，必須隱而不見。

回顧國內同志家庭主題論文，幾乎都聚焦於女同志家庭的生活經驗。近幾年婚姻平權運動獲得社會的熱烈討論及關注，同志伴侶對於家庭的想像與實踐愈顯清晰。長期研究同志親密關係的謝文宜、曾秀雲（2015）訪談了長期交往的男女同志伴侶後揭示，有些受訪者以異性戀「一對一」、「愛情、婚姻、家庭」接續的關係發展為目標，要求與異性戀一般平等的家庭論述；有些同志家庭的建構在乎的是伴侶雙方是否能落實日常生活實踐伴隨而來的責任與義務。如潘琴葳（2016）的研究所示，當同性婚姻在國內尚未法制化之前，其研究參與者生兒育女需投入的大量資源與心力的歷程，往往等同於他們「成家」的實踐。

進一步探究女同志家庭的親職實作，長期關注同婚議題的研究者曾嫵融（2013）發現，異性戀父權體制仍真實深刻地影響著女同志家庭中的生殖與

養育行動，尤其是血緣、親屬、親職三位一體的觀念。曾熾融（同上引）諷刺的以「不夠格家庭」、「不適任家長」來描述臺灣社會眼中的同志家庭；她發現在女同志的家庭中，親職並不像異性戀家庭依照血緣直接給定，同志家庭依靠的是親子間的雙向互動，靠其互動對象的肯認（confirm）來加以確認。女同志媽媽也會策略性地呈現自己為單親家庭，足見該研究發表當時，國內對於同志家庭的汙名，比單親家庭還嚴重。女同志家庭只好以「更好的親職」為職志，企圖證明自己是夠格的家庭。

獲悉女同志家庭處在不利的社會處境，潘琴葳（2019）從心理諮商的角度探問女同志家長如何透過親職實作來協助子女理解家庭組成、建立家庭認同。結果發現，受訪女同志家長相信堅定的自我認同是關鍵；繼親家長在家庭中的定位也應清楚明確，家長之間的伴侶關係也應言明；對外揭露同志家庭身份時需要考量環境的安全友善程度、子女的年紀及家庭成員的組成，同時充分對孩子說明在某些情況下，家長留在「櫃內」是為了保護家人；最後女同志線上社群扮演了重要的人際支持網絡，不僅提供主流社會不易獲得的醫療與教養資訊，也可提早為孩子建立友伴關係。

從上述國內女同志家庭研究結果可知，社會上崇尚異性戀家庭常規的意識形態，令同志家庭難以自由而平等地發展其多元的家庭想像。為了擺脫社會汙名，同志家庭必須努力達到社會上所謂正常、夠格家庭的標準；而在面對外在強大的異性戀中心結構時，同志家庭是否嘗試以不同的策略與社會外界進行認同協商？國外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可借鑑之處？

二、「安內」與「攘外」：國外同志家庭認同研究

美國有多達 370 萬以上的兒童或青少年，其家長之一為 LGBT 的族群；大約 20 萬的兒童是由同性的雙親所扶養長大（Gates, 2015）。西方探討同志家庭認同協商與溝通歷程的文獻顯示，「出櫃」是同志家庭中所有成員都必須經歷的過程（Baker, 2019; Breshears & DiVerniero, 2015）。西方同志家庭收養的孩子向同儕揭露自己的家庭認同似有不一致的做法（Gianino et al., 2009）。根據早期 Goldberg（2007）同志家庭子女揭露動機的研究，成年子女對於同性家長的性傾向認同會進行隱私界線管理（boundary control），如：要求家長不要在公開場合有親密行為；只選擇跟幾個親近好朋友訴說家中的情況（selective disclosure）；自己擬定告知身邊朋友自身家庭認同的準則，

像是以提供教育類資訊的方式來試探對方能否接受同性戀。同樣從同志家庭子女的視角出發，Breshears & DiVerniero（同上引）的研究以「溝通隱私管理理論」（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的觀點檢視同志家庭與外界的互動。該研究受訪的異性戀婚生子女成年之後並不認為同志家長的性傾向為自己的家庭認同，反倒認為這是家長自己個人的性傾向認同，與自己無太大關聯。受訪者年幼時可能還覺得自己會受到同志家庭認同的影響，但長大了自己的生活經驗之後，反而把這部分資訊的所有權歸給其同志家長，所以對成年後的受訪者來說，這份由異性戀家庭轉為同志家庭的認同是隨著時間不斷流變的（rules and boundaries fluctuate）。該研究中的成年子女不會輕易將同志家庭的資訊透露給家長的交友圈，但對於自己親近的朋友，反而不會過度保密。

儘管美國同志家庭的子女有自己揭露、管理非傳統家庭認同的策略，這些孩子在學校仍可能遭遇結構性的性汙名對待。Kuvallanka et al.（2014）指出，同志家庭的子女在校園學習過程中，容易被無視（invisibility），學校也很少提及同志家庭正面或中性的資訊，因此同志家庭的孩童在校園經常感覺到自己遭排除在外。這些青少年在學校遭到汙名時的應對策略包括：試圖融入（blend in）主流環境、隱藏同志家庭的秘密、忽略（ignore, detach）其他人的汙名行為等。作者們建議，提高同志家庭的能見度、多與其他同類家庭聚會，也許能減低這類非典型家庭被邊緣化的情況。

同志家庭在教育與訓練環境、醫療院所及職場評鑑中可能遭遇不同類型的微歧視（microaggressions），其與一般的歧視行為同樣能造成強大與潛在有害的影響（Sue et al., 2007）。Haines et al.（2018）發現，同志家庭成員（家長或子女）遭遇的微歧視涉及：（1）家庭的正當性，指同志親密關係不是「真的」關係，只是跟室友或朋友發展出來的關係，因此同志家庭被認為不是真的婚姻；（2）違反異性戀主流或宗教家庭價值，因為同志往往被過度性化、指涉為淫亂與刻板化，所以同志家庭成員間在公開場合的情感與肢體表達較容易受限縮；（3）家庭內的性別角色，指同志家庭缺少一男一女的傳統性別角色成員，所以不被認可為真正的家庭。上述微歧視皆以異性戀正典為審視的標準而衍伸出眾多恐同行為，而同志家庭也因為不符合傳統的性別角色、性別認同、性別表現、與家庭成員組成而易被外界妖魔化。

因為同志家庭認同經常遭受不具正當性的挑戰，西方學者認為同志家庭內的意義協商與論述的建立對於穩定家庭關係具有其重要性（Galvin,

2006)。Baker (2019) 發現，當男同志家長向孩子說明自己的家庭現狀與家庭的意義時，必須面對「傳統家庭結構論述」與「非傳統家庭結構論述」之間的反覆辯證 (dialectics)。男同志家長表示，自己的家庭內互動免不了會受到傳統家庭結構論述所干擾與影響。為了協商此辯證，家長傾向以娛樂或輕鬆的策略 (entertaining) 來論述非傳統家庭結構的功能性和價值，為孩子打造一種「新正常」 (new normal) 的觀念，經常性地灌輸不一樣的家庭或非傳統的家庭並沒有不好的觀念；或是否定 (negating)、遠離以傳統異性戀核心家庭結構為主流的論述趨勢。Breshears (2010) 研究女同志家長如何藉由重要的家庭轉捩點 (turning points) 來為孩子強化自身的家庭認同，結果發掘：第一次跟孩子出櫃、共同面對外界對家庭正當性的挑戰、以及紀念性的婚禮或關係儀式都是成為家庭論述的重要素材經驗。此研究的受訪者也指出每天的家庭對話 (everyday conversations) 對家庭認同的建立頗有助益。

上述文獻揭示，同志父母意識到他們的性傾向可能對孩子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亦即身在同志家庭中的孩子們必須小心翼翼地思考「如何」以及能夠「向誰」揭露自身家庭型態。為了排解同志家庭子女可能對自身家庭感到的羞恥與尷尬，同志家長所面臨的挑戰是為孩子們打造一種穩定、安全的家庭認同論述。與此同時，Breshears & Beer (2016) 指出同志家長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社會外界流傳的負面論述時，所必須協商的少數族群認同與社會位階，亦至關重要。因此，他們在南非的研究中採納「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 的視角，嘗試向同志家庭成員 (包括 17 位同志母親、4 位同志父親、8 位青少年子女、及 4 位成年子女) 提問：同志家庭是如何協商外界社會看待他們的態度，以維繫或創造一種正面的家庭認同？研究結果發現，同志家庭成員經常藉由「忽略」 (ignoring) 負面的社會觀感；多與認同自身家庭的親人朋友們相處，為孩子「創造安全空間」 (creating safe spaces)，以減少直接遭遇歧視的機會；及「在公眾場合改變自身行為」 (altering behavior while in public)，避免與伴侶過度親密，引人側目等策略來協商社會態度。

不論是在學校或職場，來自同志非典型家庭的成員，或被視而不見，或被高度注視 (hypervisibility)、妖魔化 (Dixon & Dougherty, 2014)。Breshears & Beer (2016) 提道，身具「雙重」或「三重」 (double or triple minority status) 弱勢身份的同志家庭成員在與外部社會互動時，甚至必須經歷多重困難 (multiple difficulties)。而臺灣的同婚合法化之後，同志家庭是

否也如國外研究所述，對外協商家庭認同與社會位置時感到步步為艱？

三、溝通理論視角：

Mark Orbe 之共文化理論 (co-cultural theory)

臺灣同志家庭與主流社會系統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溝通樣態，可採用 Orbe (1998a) 的「共文化理論」(co-cultural theory) 來理解。根據 Orbe 的定義，共文化溝通指的是在社會上處境不利、不被看見的弱勢群體與掌握主要權力、優勢群體成員之間的溝通行為。當弱勢群體使用特定的溝通策略，並且有一特定的目標，希望能被強勢群體所接納時（如同志家庭認同），該過程中弱勢群體所使用的策略為何 (what) 及其如何被使用 (how)，正是共文化理論所企圖看見的溝通歷程 (Bie & Tang, 2016)。

植基於性別研究中的「消音群體理論」(muted group theory) 與「立場理論」(standpoint theory)，Orbe (1998a) 系統性地歸納出一系列實際的互動行為（如表 1 所示），其用意不在於定義這些不同的實踐與行為，而是「看見」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溝通的整個過程究竟如何進行，期間他們可能遭遇的不平等對待又是如何。

Orbe (1998b) 早期的研究結果，指出了六種可能影響弱勢群體與掌握社會主要權力的組織或群體間溝通進行的主要因素，包括 (Orbe & Roberts, 2012)：(1) 預期結果 (preferred outcome)：三種預期結果的形式較常發生。「同化」(assimilation)，遵循強勢群體的生活規則；「順應」(accommodation)，試著去反映弱勢群體的生活經驗，能在社會上被接受和取得適當的空間，並達到文化多元性的結果；「疏離」(separation)，在跨文化互動中與其他共文化群體合作，創造出反映弱勢群體文化規範與價值，維持自我獨特的文化認同。(2) 過去經驗 (field of experience)：溝通者過去的生活經驗將會影響其如何抉擇共文化溝通實踐。這些經驗包含家庭的影響、社會化歷程、正式與非正式教育、關鍵事件等。(3) 能力 (abilities)：共文化溝通實踐的發生端賴弱勢群體溝通者是否具備相符的能力，在合適的個人特質與情節環境下，才能予以實踐。(4) 情境脈絡 (situational context)：思考詳細的脈絡與環境因素，以選擇適合的溝通實踐。(5) 預知損失與回報 (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從過去的經驗累積，共文化溝通者可預先判斷某些溝通實踐可能帶來的損失或效益。(6) 溝通取徑 (communication approach)：

表 1：共文化理論取徑與傾向

		預期結果 Preferred Outcome		
		Separation 疏離	Accommodation 順應	Assimilation 同化
溝通取徑 Communication Approach	非斷然自信 Nonassertive	Avoiding 迴避	Increasing Visibility 提高能見度	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強調共通性
		Maintaining Barriers 保持困難障礙	Dispelling Stereotypes 驅散刻板印象	Developing Positive Face 培養正面價值
				Censoring Self 自我審查
	斷然自信 Assertive		Communicating Self 溝通展現自我	Averting Controversy 避免爭議
		Exemplifying Strengths 證明優勢	Extensive Preparation 全面性準備	
		Embracing Stereotypes 接納刻板印象	Intragroup Networking 內群體網絡連結	Overcompensating 過度回報
			Utilizing Liaisons 運用中間人	Manipulating Stereotypes 操控刻板印象
			Educating Others 教育他人	Bargaining 討價還價
	挑戰 Aggressive			Dissociating 解除關聯
		Attacking 攻擊	Confronting 直接面對	Mirroring 模仿
Sabotaging Others 蓄意破壞他人		Gaining Advantage 獲取好處	Strategic Distancing 策略性疏遠	
			Ridiculing Self 自我嘲諷	

資料來源：Orbe & Roberts（2012）

弱勢群體可透過三種溝通取徑來表達自己的意見：（1）非堅定自信的取徑（nonassertiveness），指的是個體受制約，不直接面對挑戰，以他人的需求為主以迴避衝突；（2）堅定自信的取徑（assertiveness），意指個體願意表達感受、想法、主張自我的權利，以雙方的利益導向為出發點考量的意見表達；（3）挑釁的取徑（aggressiveness），以強勢、攻擊的手段要求對造考量我方的需求與利益，並忽視對方的需求。

上述的六項因素之間彼此互相影響（interdependent），全面整合成一個理解共文化溝通策略選擇的理論架構：

共文化群體成員以其過去經驗（field of experience）中對於行為後可能產生損失與回報（perceived costs and rewards）的認知為基礎，搭配他們對自我運用的能力（abilities）與溝通實踐行為的瞭解，他們會選擇採用某些溝通傾向（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搭配他們所傾向的預期結果（preferred outcomes）及溝通取徑（communication approaches）—以適合該特定情境事實（specific situation）的策略與其他強勢群體成員溝通（研究者翻譯，Orbe, 1998b, p. 19）。

這六項要素都是共文化群體成員進行跨文化溝通時的重要準則。其溝通取徑搭配想要的預期結果，可構成九種溝通傾向（communication orientations）（Orbe & Roberts, 2012）。請見表 1 中的說明與解釋。

過去以共文化理論做為研究框架的實證研究，通常是針對一共文化在某種特定結構、組織情境下所進行的探討，例如：在美國的穆斯林群體（Bashir & Rohani, 2009）、在組織中的非裔美人領導階層（Hopson & Orbe, 2007）、以及亞裔女性教師在白人為主大學的教學處境（Lee, 2006）。與本研究尤其相關的是 Camara et al.（2012）針對同志群體在美國社會面對性傾向歧視的溝通因應策略。該研究特別著眼於同志群體所遭遇的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與人際偏見（interpersonal prejudice）如何影響性傾向歧視互動的因應策略進行探究。作者們強調，西方社會的異性戀中心主義嚴重的邊緣化各種非異性戀的種族、族群、階級，同志群體最容易遭受歧視的情況通常是在公共領域與陌生人之間的互動。作者建議，同志群體或可先偵測公共場域的性別友善程度，以免遭遇不平等的對待。另外，Bie & Tang（2016）的共文化溝通研究指出，中國已（異性）婚男同志向身旁的家人親友的出櫃經驗受

文化價值觀中的家庭、婚姻與責任感影響至深，因此在中國重視群體主義與華人文化習俗的脈絡下，他們分析的出櫃故事除了與權力階級有關之外，亦傾向符合文化適切性的社會關係維繫模式（culturally appropriate manner），因此該研究的已婚男同志多以堅定自信的同化（assertive assimilation）、堅定自信的順應（assertive accommodation）、及非堅定自信的順應（nonassertive accommodation）為主要溝通取徑，亦即他們嘗試主動或被動地遵循主流異性戀正典，不論出櫃的對象是父母或異婚的妻子，男同志都以「繼續維持正常異婚」為前提，以確保家人接納其同志身份。

Orbe & Roberts (2012) 指出，共文化理論應該被視為一個非固定（non-definitive）、動態（dynamic, adaptable, stretchable）與進行中（work-in-progress）的理論架構。因此，Orbe & Roberts（同上引）傾向以「理論化」（theorizing）的說法來強調共文化理論所凸顯的非恆定特質，並主張該理論化的過程，能夠讓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得以不斷擴大自身對共文化群體策略性協商的複雜性理解。換言之，共文化理論發展至今，其核心精神與對學術界的貢獻乃是 Orbe 與共同研究者結合世界各地的實證研究成果，持續擴展不同的共文化脈絡化溝通協商與實踐洞察。本研究選擇共文化理論化框架，期望研究結果能協助其他研究者，深入理解尚為少數的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協商其家庭認同的跨群體溝通過程。

綜觀上述，每個人的生命過程中，可能出現不只一種家庭型態：例如從傳統核心家庭轉變成單親家庭，又轉變成繼親家庭。個人可能因為不同的生命歷程而進入不同的家庭型態，但是多元型態的家庭卻很少在體制內受到討論。家庭認同的協商需要內部家庭成員彼此之間，以及成員與外部社會的雙向溝通。同志伴侶面臨少數族群組成家庭之壓力，學者不僅應關注其個人層面的議題，同時也需要探討來自人際、組織機構、文化規範與政策等社會結構層面對其非傳統家庭之形塑。Yep (2002) 曾透過「內部—外部／個人—集體」（interior-exterior / individual-collective）構面所形成的四個象限，概括分類既有研究所探知的同志相關議題。臺灣的同志研究大多聚焦探討個人如何面對內化恐同與外界仇恨犯罪等主題（individual / interior-exterior），有關同志作為一個集體（例如：同志伴侶）對內面對各種媒體論述暴力（discursive violence）或外部機構（例如：社會系統、教育單位、組織機構）（collective / interior-exterior）所強化的異性戀正典體制則較少被關注。故，本研究藉 Orbe (1998a, 1998b) 之共文化理論為研究框架，試圖理解臺灣同志家庭與

外部社會（如：學校、組織、教會、醫療院所）溝通以協商家庭認同之過程：臺灣同志家庭與外部社會如何協商其非典型家庭認同？其過程是否可見共文化溝通取徑？其確切採用的溝通傾向為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歷時兩年的質性深度訪談研究。本研究初期曾針對同家會過去所出版之訪談及田野資料內容（例如：刊載在《彩虹家庭電子報》的文章與報導）進行資料檢索，以協助研究者進入田野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本研究最後透過同家會及臉書上的人際網絡，以滾雪球的方式接觸到全臺各地八個同志家庭（表 2）。在初步建立關係之後，邀請各家庭其中一位同志家長參與本研究。雖然國外文獻不乏出現以子女經驗為主的家庭認同研究，但本研究考量受訪家庭中的子女多為幼年兒童，因此未將各家庭中的子女納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

本研究定義「同志家長」為性傾向認同是同性戀或非異性戀的拉媽與 gay 爸，包括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關係生兒育女者，同時已向外部社會群體表明其同志家庭認同或無特別欺瞞者。這五個女同志家庭與三個男同志家庭的居住地分別位在臺北、臺中、臺南、宜蘭，筆者每隔幾個月的時間便與參與研究之同志家庭家長會面訪談，不過研究後期（第三次訪談）因為遭遇 Covid-19 疫情，所以部分訪談是以線上語音進行。第一次深度訪談為「家庭史訪談」（2019 年 1 月到 3 月之間），目的在聽取同志家庭的組成歷程，包含同志家長的相遇及其決定共組家庭之細節種種，每個家庭平均花費一小時。

第二次深度訪談為「家庭與外界互動經驗訪談」（2019 年 4 月到 6 月），重點在開放性地探知同志家庭在生活中與外界群體互動之正面與負面經驗，並聚焦於同志家長在這些經驗中如何協商其家庭認同，每回訪談平均花費兩小時。在第二輪訪談中，首先根據理論文獻提出可能出現日常互動的外部機構，比方孩子的學校、自身職場、教會、醫療院所等互動提問（Rostosky & Riggle, 2017; Sue et al., 2007），而後再鼓勵受訪者更開放性地回溯其他環境脈絡下的經驗，擴增如：街坊鄰居、社群媒體、線上社團、政府機關等外界群體互動情形。受訪家長幾乎沒有提到在宗教聚會場所，如教會，出現的外界互動經驗。訪談綱要大致如下：（1）如何定義自己的家庭類型？（2）目前有哪些外界人士（子女學校、職場、教會或其他）知道你的同志家庭身份？

(3) 當初讓外界知道自身的家庭認同是基於何種理由？(4) 如何 (how) 向外界透露你的同志家庭身份？(5) 外界的反應為何 (what)？(6) 你如何依外界反應繼續與其互動溝通 (how)？(7) 是否聽聞過其他同志家庭與外界的互動故事？情況為何？

第三次深度訪談為「更新現況訪談」(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2 月)，當受訪同志家長在前兩次訪談中理解本研究目的後，筆者邀請其於生活中加強留意並記錄後續與外部社會互動之經歷，並於第三次訪談中分享，平均花費一個半小時。受訪家長在第二輪訪談中擴充探討的「外部組織」環境脈絡，個人也在第三輪訪談中請所有受訪家長補充說明是否也有此類外部情境經驗。特別的是，第二次訪談與第三次訪談之間，正逢臺灣通過釋字第 748 號施行法，因此亦針對同婚專法通過後，受訪家長所遭遇之社會反饋進行討論。

本研究採行的資料分析方法為：(1) 描述性分析 (descriptive analysis) 將龐大的資料依據其組成歸納為不同類別的過程，目的是從資料中找出類型、規律性或是主題；(2) 理論性分析 (theoretical analysis) 則是進一步解釋資料中類型如何組成，或是解釋研究者所理解到的規律性與特殊主題性。本研究結合上述兩種分析方法，確切的資料分析步驟包括：資料整理 (data management)、閱讀資料與筆記 (overview reading)、釐清主題類型 (clarification of categories)、與呈現資料 (presentation of data) (Angrosino, 2008)。

表 2：受訪同志家長資訊

代號／年齡	性傾向／婚姻狀態	居住地	職業	子女
y/41	女同志／固定伴侶	臺南	自由業	男孩 4 歲 (於前異婚所生)
a/38	女同志／已婚	宜蘭	餐飲業	男孩 4 歲 (a 所生)、女孩 1 歲 (太太所生) (人工生殖)
m/37	女同志／已婚	臺南	醫生	4 歲男孩 (太太所生)、2 歲男孩 (m 所生) (人工生殖)
h/42	女同志／固定伴侶	臺中	政治工作者	18 歲男孩、12 歲女孩 (皆為前異婚所生)
c/37 i/46	女同志、酷兒／已婚	新竹	作家、心靈療癒師	2 個國中生女兒 (i 於前異婚所生，c 已收養)
L/43	男同志／固定伴侶	臺北	金融業	3 歲男孩、1 歲女孩 (兩位不同代理孕母)
T/45	男同志／已婚	臺北	醫生	3 歲男孩 (代理孕母)
D/46	男同志／固定伴侶 (目前已婚)	臺北	醫生	4 歲男孩 (代理孕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肆、研究結果

男女同志及其生、收養子女家庭的家庭認同內涵不盡相同，本研究將八組家庭依其成員組成，劃分為「女同志家長與前異婚子女家庭」、「女同志家長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及「男同志家長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等三組，企圖更細緻地展現八個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的過程。以此結構呈現訪談結果，並非表示各組家庭的溝通傾向僅有下述可能，或各組間傾向彼此互相排除。相反地，同一個溝通傾向可能同時出現在不只一組家庭類型中，例如：「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不過各組家庭實踐的情境脈絡與結果各不相同。本研究僅招募到八組受訪家庭，確為其限制，研究結果亦無法推論至所有同志家庭。

一、女同志家長與前異婚子女家庭

（一）社群媒體上公開同志家庭認同

兩位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的受訪者在歷經不同的生命階段轉換之後，選擇在社群媒體上發文，以一次性的方式，公開自己新的身份與家庭認同，近似共文化理論中的「溝通展現自我」（communicating self）。y 選擇在自己某一年生日的時候在臉書上貼文公開自己是「拉媽」，她認為如此一來自己就無需向同事親友一一解釋。h 同樣利用臉書公開自己家中的新成員，並且從此享受在臉書上發送與伴侶「放閃」照片的樂趣：

我現在在做的就是，爭取權益或者是讓大家知道「我們沒有不同」。所以「放閃」也是一種倡議！我現在的立場其實踩的很硬啦，然後我的心理素質也比較強（h）。

其實 h 提到，自己當初揭露與前夫離婚的消息時相當恐懼，擔心他人會批評離婚後的自己。結果證明她在公開自己離婚的身份後，反而贏得更多友情。同樣地，y 和 h 都指出，在臉書上揭露自己是女同志家長的身份，獲得多數臉友正向的支持，她們猜測可能持負面觀感的臉友，也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和性別平等的趨勢而不願輕易表態。

（二）嘗試融入女同志圈內線上群組

西方研究指出，性少數在社會上遭遇的歧視多數來自陌生人或公共領域的互動，建議同志家長善用圈內（in-group）社群資源，為孩子尋找人際網絡，維持家庭認同的發展（Breshears & Beer, 2014; Camara et al., 2012），如共文化理論所歸納的「內群體網絡連結」（intragroup networking）傾向。乍看「女同志家長線上群組」應該為不需要特別協商同志家庭認同的網路組織，但是細聽受訪者們的故事之後，研究者發現曾進入異婚的女同志家長與其子女，幾乎被女同志家長社團的某些成員視為「圈外份子」（out-group）。

y 在離開異性戀婚姻後嘗試透過女同志線上群組（Line 和 PTT）建立人際網絡，可惜當她向群組內的成員表明自己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之後，遭受不少冷嘲熱諷與負面的回應。

很多人會覺得，妳是不是〔異性戀〕婚姻不幸才會想要來找女生？妳是不是因為離婚，所以才找女生？就覺得男生造成妳很多傷害。我覺得拉媽背負很多這種刻板印象跟罪名（y）。

y 加入女同志社群後經常被詆毀，在 PTT 的拉版上也被質疑是上線來找陽剛女同志來幫忙養育小孩。種種酸言酸語導致 y 一再懷疑自己「不夠格」建立同志家庭或是擁有同性伴侶。為了平反，y 創設一個「拉媽版」，試圖創造屬於自己的社群，鞏固自己的內在家庭認同，號召與自己處境相似的拉媽加入。雖然截至訪談為止，參與的拉媽人數並不多，但 y 還是在線上為自己找到了一些拉媽同伴。

我去拉版，就發了一個文，我說我是一個拉媽，就是我有曾經有跟異性戀結婚過，那現在我自己帶孩子，我離婚了。我要找跟我一樣，也許妳還在異性戀婚姻裡面，妳很痛苦，也許妳正準備要離婚，妳不知道找誰講。我覺得不管妳是哪一個處境，我希望我們可以集結起來。在這個群組，妳潛水沒有關係，妳半年不講話我都不會踢妳走，可是如果有一天妳真的覺得很痛苦了，很想講這件事，我們會在這邊（y）。

女同志社群中有些人認為像 y 曾經進入異性戀婚姻，又育有年幼小孩的女同志「不純」、「不配尋找伴」，甚至反對單身的女同志與拉媽養育前異婚

所生下的小孩。y 不滿女同志圈將她的小孩歸為「血統不純正」，訪談間透露出內心卡在那個「真的」女同志家庭的定義、「怕被嫌棄」等外界說法。

研究指出，對於像 y 一般較為年長的同志來說，家人的價值、對自己原生父母的尊敬與愛（filial values and love and respect for her parents），都是他們過去決定進入異性戀婚姻的重要原因。有不少人為了實踐親屬角色（Kam, 2013）不得不進入異性戀家庭，但也同時發展同性戀關係（Brainer, 2021）。

被女同志社群質疑為「非典型中的非典型」家庭的還有 c。她和曾經進入異婚的太太 i 經常被女同志社群挑戰「不是真的女同志家庭」，因為她們的處境「不夠可憐」、「不夠辛苦」、「沒有太多被欺負的經驗」。i 和 c 沒有經歷過人工生殖的苦，等同於彼此「撿到便宜」。所以她們在女同志家庭私密社團被問到「那妳們有去登記嗎？」彷彿堅定的女同志關係完全取決於有無婚姻關係（Lannutti, 2018）。c 與 i 無奈地表示，他們很期待受圈內人所支持，但這些質疑使她們有一種「被自己人推開」的感覺。

上述發現與潘琴葳（2019）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潘琴葳發現社群為女同志家長提供了訊息傳遞、情感支持，同時肯認同志與家長雙重身分，給予孩子同儕的重要功能。究其因可能是潘琴葳的研究調查的幾乎是伴侶共同計劃生育的女同志家庭（planned lesbian families），同質性高，其所遭遇的困難與組成家庭的過程也類似，其與本研究曾經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女同志家長處境不同。即便國內女同志家庭型態以繼親家庭（lesbian stepfamilies）居多，然而這類家庭的境遇卻鮮為人知（洪于珊，2012）。

筆者詢問 a 與 m（與其太太皆為人工生殖）加入同志媽媽社團的過程，a 表示自己參與時並未特別遭遇困難，她強調「〔社團成員〕很怕被打擾，所以篩選機制嚴格，一定要真的拿到媽媽手冊，而且一定需要推薦人」。因此，曾經進入異性戀家庭的女同志家長，在申請入會時就會備受討論。社團會評估她們交往的時間長度、是否已登記結婚。m 直接說道：

每次有曾經進入過異婚的媽媽要加入時，我都覺得這社團內有好多〔元老級人物〕，說些荒謬的言論，彷彿只有自己是女同志媽媽的正宗血統傳人。社團內偶也有火氣，幾個〔元老〕都說出：「如果新人加入，我就退社」。然後大家都還要哄她們（m）。

a 指出，在女同志圈，如果從未與異性交往過者，尤其是婆，評價會比較高。針對此事 a 後來悟出了另外一番道理：倘若是雙性戀但是卻選擇跟同

性共組家庭，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決定，「因為她不是選擇一條好走的路」。

(三) 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c 和太太 i 認為自然地與大眾互動，有助於「撕標籤」，近似於共文化理論中的「提高能見度」與「驅散刻板印象」(increasing visibility and dispelling stereotypes) 傾向。住家附近菜市場裡雖然有很多閒言閒語，但 i 覺得大家都是鄰居沒有必要交惡，所以繼續如常般互動。c 和 i 手勾著手一起去買菜時發現，有些攤家雖然會以異樣眼光看他們，但也有不少小販會透過行動來表達善意，例如菜市場賣花枝羹的阿伯，對她們一家人噓寒問暖，態度親切，有些菜販甚至會親自送菜到她們家。i 自認「沒有櫃子」，因此不必要一直懷疑其他人是不是對自己有敵意，強調自己願意給對方時間去理解、調整心態，也會教孩子如何剔除自己身上的標籤，她稱之為「家庭內功」。

一剛開始，應該是小一小二的時候，女兒們就會介紹說，c 是「我阿姨」這樣。然後等到二年級、三年級搬去花蓮的時候，同學就會問她們，因為就是換了一批新的同學，她們又要再解釋一遍，所以她們就會說，她是 c，她是我的家人，那你們就跟我一起叫她 c 就好了 (i)。

女兒們在花蓮學校的同學、老師、校長因為這一家人不掩飾、不迴避，所以對她們一家人自然地表現出支持。連學生家長看到 c 和 i 在校園散步，或是一起參加家長會，也都能跟她們直接談教育、聊親子關係，不會對她們的關係多做評斷。i 不斷強調一定要先修復自己，清楚自己的內在信念想法與自我認知，她說：「我們自己是什麼樣子，我們所共振出去然後收到的外界回應與社會，就會是什麼樣子」(i)。

h 與女友分住兩地，雖然女友經常出入她臺中的家，但是基督教鄰居遇到 h 的家人會迴避談論女友，就算在社區遇見 h 和女友一起出現，也會刻意忽略女友的存在。h 認為源於異性戀霸權，鄰居對同志家庭流露出來的「假尊重」才是日常生活中比較嚴重的問題，如 Moreira (2018) 提出的「慢性暴力」(slow violence)。所幸同婚通過之後，h 信心大增，有了法律的保障，她也能更有自信、更自然地面對社區的鄰里與管理員。

(四) 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前幾年 h 參與地方民意代表選舉時，出現很多可以面對面跟一般人對話、教育社會大眾有關同志家庭認同的機會 (educating others) (Orbe & Roberts, 2012)。h 發現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有特別的反應，在街頭少數前來踢館的人多半顯現對於性平教育內容存在許多誤解，幾乎都是道聽塗說之後就想以其非傳統的家庭型態來刁難 h。另外，h 也透露或許因為她的社經地位（政治工作者）的關係，所以一般大眾不敢明目張膽地挑戰她的家庭背景。而她自己也很確定自己的身份認同，所以那種無懼讓外界沒有可以恐嚇或施力之處。舉例來說，h 女兒的學校老師在臉書上得知 h 是女同志之後，私底下跟女兒說：「妳媽媽的事情盡量不要告訴別人，這樣子比較好」。h 知情後把女兒向外界協商自己身在同家庭權利留給女兒，她相信與其躲藏，同志家長對孩子的教育、給孩子建立的自信，會影響孩子如何去面對外界眼光。

孩子的人際關係，還有他父母的社經背景，他自己對他自己的自信這個東西，都有關係。比方說當我不覺得這件事情有問題，你不需要因為這件事情覺得羞恥，如果有人因為這樣那你就跟我說，我們做一件事情是坦然的時，他對這件事情他就沒有那個壓抑、擔心、害怕。所以他在人際之間的互動，他展現的不會那麼畏縮，他被霸凌的機會也會小。然後還有因為我從小一到小四，我都有去他們班上說故事，所以我會讓他們班上的同學認識我，然後他們對我有一個認識跟理解跟喜歡我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會讓我們比較有機會跟他們班上的同學親近、理解，那個也會讓小孩比較安全 (h)。

後來 h 的女兒選擇跟比較要好的同學分享自己的家庭認同，結果不但沒有造成同儕反感，還意外發現班上其實也有其他女同志家庭。同志家庭權益倡議者吳少喬 (2021) 感嘆同志家庭普遍不被學校看見，家長們只好藉晨光時間，以「真實存在」的出現，讓孩子們看見不一樣的家。知名 Gay 爸陳子良根據其在美國的親職經驗，呼籲臺灣能將同志家庭元素循序漸進加入學校的家庭教育單元 (孫子靖、陳振豪，2019)。

曾經將自己親身的同志家庭故事出版成一本書的 c 認為，一般人也許是因為不理解同志家庭議題，不認識任何同志家庭，因此不懂得如何去溝通。因此當她自己在面對他人的好奇時，並不吝於去說明：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家庭認同的問題〕，那基本上，你的提問對我來講都只是好奇而已。那我能夠回應給你的，我一定會全部回應，可是那要不要接受，我們會交給對方（c）。

受訪者 c 並不怯於與外界談論、交流其同志家庭認同，只是互動對象的反應與回饋各有不同，有時很難在當下看見明確改變。

二、女同志家長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

（一）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庭常態

面對不知情的外界，a 和 m 的家庭皆傾向先不表明同志家庭認同的身份，而是從日常往來或工作服務的過程中讓職場上的他人看見自己（increasing visibility）（Orbe & Roberts, 2012）、接觸與相處，然後自然地發現他們原來是同志家庭（the process of making you see）（Friedman & Chen, 2021）。筆者認為此與華人傳統社會關係中的含蓄政治（politics of reticence）與默言寬容的文化思維有關，其並非意圖隱藏同志家庭認同，而是以關係互動維繫為前提，試圖撐出同志家庭被看見的可能性（李佩雯，2018；胡郁盈，2017；Liu & Ding, 2005）。

開餐廳的 a 和太太待人和善，她們遭遇的外部經驗大多算正面。一開始 a 和太太也不多介紹自己，而是讓鄰里、顧客慢慢認識她們是怎樣的家庭，以提高自我的能見度來消除一般人對同志的刻板印象。a 不去強調自己的家庭很特別，傾向自然地與店裡的顧客互動，因此其他人對 a 一家人的態度也很自然，順理成章地接受。

我們的經驗是，我們不是很直接，在大家不認識我們的時候，我們就直接很高調地說我們是同志，或我們是同性家庭什麼的。都是先有接觸，因為店家嘛，那我們通常是採比較中立的，我們不是很直接表示我們是彩虹店家，那大家來了可能會有各個立場的人，他們會從餐飲的接觸、服務的接觸，對我們是好的印象，之後知道了會覺得，欸？其實也不錯啊，也沒什麼不一樣（a）。

m 參加太太的員工旅行時，自覺不需要透過言語出櫃，而是直接以日常

互動示人，如異性戀家庭般，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tacit subject）（Acosta, 2011; Decena, 2008）。m 太太的上司，雖然看著 m 說不出口「女朋友」或「太太」的字眼，但是卻讓 m 比照公司的其他眷屬，一起參與尾牙抽獎。

（二）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受訪者 m、a 都曾經接受全國性與地方性新聞報導，談論自己的同志家庭。她們與自己的伴侶都有心藉溝通自我與教育他人的傾向（communicating self and 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增加同志家庭在媒體上的能見度，盡己之力進行社會運動。雖然必須犧牲自己的隱私，但是透過電視節目的深度報導，觀眾得以更深層地理解同志家庭型態。受訪者在回應外界的提問或質疑時，皆嘗試達到觀念釐清的教育功能，例如性傾向、性別角色、親職角色等概念說明。從他們揭露的經驗中不難發現，一般人經常受「性別二分」與「異性戀正典」的意識形態所綁架。

社會過度刻板的性別二分與性別表現想像，出現在 a 的伴侶親職角色經驗上。a 的太太外型中性，因此有任何粗重活，鄰居都認為應該是 a 的太太負責。面對其他性別刻板所延伸出的疑問，受訪者們坦言必須耐心說明。

鄰居就說：「妳們以後會教妳兒子就是譬如說跟男生交往，還是跟女生交往這樣？」我就說這個我們不會特別去教，因為那就是很自然的性向，像我爸媽他們也不是兩個媽媽，他們也沒有教我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然後他們突然好像喘一口氣這樣，他們就說：「喔，那這樣子就好」（a）。

如 h、m 提到自己的高社經地位，致使職場同事不至於挑戰自己的同志身份。作為醫生，m 發現他身邊的病患、護理師對其同志家庭身份似乎欣然接受，甚至當她帶小孩到醫院時，護理師們還會主動幫忙照顧。

我有一個病人，他顯然本來對同性婚姻不以為然，他大概六十歲左右，一個男性。他進來就拿著他的手機，然後翻到我跟我太太五月二十四號去登記有一個新聞稿，他就說：「欸，恭喜妳喔！很幸福喔！妳有沒有覺得立法太快了，公投明明就不同意同性結婚啊。」然後我就好好跟他講，而且他還很認真聽。所以我覺得要不

是我是醫生，他不會願意花這十分鐘聽我們之前修法的過程。所以對外溝通我是非常受益於我是醫生的這個身分（m）。

但 m 坦白當初也是等自己升上主治醫師後，才願意直接揭露自己的家庭認同。她發現醫院裡的基督徒長官對於其家庭認同的回應運用「階段性」循序漸進的方式，一開始不願回應，採“don't ask don't tell”的策略，後來才慢慢接受。m 遭遇的挫敗主要來自陌生人對她外在性別表現（gender presentation）的挑戰。外型中性的她曾帶著孩子參與選舉造勢場合時遭陌生人「微歧視」（Haines et al., 2018; Sue et al., 2007）：「妳們是同志家庭喔？」「妳是公的還是母的？啊，妳推娃娃車，妳是母的。」m 當下盡量表現溫和，並試圖機會教育，邀請對方認識自己現場的家人。遺憾的是對方不願對話，撂下此言後立刻走閃。曾熾融（2019）指出，不受社會肯認所造成的焦慮迫使女同志家長只能依靠強化親職照顧，以確保自身家庭的正當性。甚至不斷挹注資源來創造孩子在學業和教育上的優勢，以防孩子受外界不友善的對待。m 在受訪時揭露，她的太太因為上述的微歧視經驗，要求兩人必須對親職實踐投注加倍心力，以免兩個兒子對自我的家庭認同有所懷疑。

（三）「挑戰」異性戀中心家庭體制

同婚通過前，m 和太太便已登記為法定伴侶，當時適逢調換醫院單位，新單位的院長在他剛到職為全家申請宿舍時勸戒她要「低調」，院長的說法是「小地方不要張揚這種事」。宿舍申請的承辦人甚至指明宿舍還是要跟「家人」同住最好。m 當下並未理會，照樣填寫當時的伴侶為家人來申請宿舍。

我不知道「低調」是怎樣。因為單身宿舍就有點像學生宿舍一個房間，那我要申請的是公寓型，他就說那妳跟妳的家人？誰跟妳同住？然後我就寫了「同志伴侶」。那個承辦的人就很困擾，他不知道這算不算家人。因為理論上我跟我太太還有當時的大兒子，我們法律上就是沒有關係嘛。他就跟我說最好是家人，然後我就管他，我就寫了，寫了他也就沒有再退回來，他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了（m）。

a 認為自己與家人出入醫院或公家機關的經驗相對正面，她帶小孩看小

兒科時，主動將表格上的「先生」或「爸爸」一欄劃掉，更改成「伴侶」或「家長」，態度也很友善與自然。

小兒科其實也很清楚，我們甚至有時候都會想說，欸？他剛剛是叫〔我太太〕「媽媽」嗎？啊他怎麼知道？就是我們都一起去，正常都是叫我媽媽，有時候是甚至出來才想說他們怎麼都沒有疑問？然後就想說啊，可能我填表格，我都會很自然地在「先生」那邊劃一撇，就寫「伴侶」，所以他們可能自己就會拼拼湊湊。後來我就發現他們其實很容易記住我們，然後對我們也蠻關心的、也蠻友善的（a）。

母親節時，a 女兒的學校要求交一張母親的照片，a 和伴侶會自動繳交兩張照片，作為提醒校方與老師多元家庭存在的方法。a 認為學校的回應算是友善，還會請小孩帶回兩束母親節花朵送給媽媽們。

研究指出，女同志對於臺灣同婚通過能夠為同志家庭帶來的保障存疑，她們認為法律制度也無法自動根除同志生活所要經歷的歧視與不便（Chen & Wang, 2010; Friedman & Chen, 2021）。即使在法律上是家人，但生活實踐上仍可能在某些情境因為主事者性別觀念跟不上，而需要受訪者們積極主動發聲來為自己爭取權益（confronting and gaining advantage）（Orbe & Roberts, 2012）。如 Ching（2010）所言，性少數必須在常規（normativity）的兩個層次上游移，一方面是評估或挑戰本身就存在多重意義與矛盾的「正常」作為一種可能性，另一方面同時改造「正常」成為一種可能（assessing ‘normal’ as a possibility and transforming ‘normal’ into ‘possible’）。換言之，性少數在日常生活中必須一方面檢驗以異性戀為準則的正典是否合理，一方面改變、創造出適合性少數的常規。

三、男同志家長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

（一）漸進式協商同志家庭型態

前文提及，外界對於本研究同志家庭認同接納，有些採階段性進行。其實受訪家長在協商自己的家庭認同時，也可能採漸進式策略，強調與主流異性戀群體的共同點，以避免爭議（emphasizing commonalities and averting

controversy) (Orbe & Roberts, 2012)。男同志受訪者不願意在情況不明的狀態下向小孩的學校表明自己是同志代孕家庭，一來是因為自己當下可能沒有親密關係伴侶，二來是還不確定學校對同志家庭是否會產生惡意。如曾熾融 (2013) 與潘琴葳 (2019) 研究中的女同志家長所言，如果家長評估現實環境的友善程度將會造成出櫃後的不利後果，則家長們通常會在確認職場和幼小子女學校的狀況後，不主動提起自己是同志家庭。但是這樣的抉擇亦可能造成家庭認同建構上的兩難，因為家長也會擔憂孩子誤以為自己不正常，才會需要被隱瞞。

受訪男同志家長起初選擇以「單親代孕家庭」的說法來測試校方的反應。D 提到，「這個社會就是比較能接受女女組成家庭」(D)，他在幫兒子找學校時會語帶保留地強調自己是單親，藉以試探校方會如何回應與照顧單親的小孩。D 曾經跟三家幼兒園談過，其中兩個比較保守傳統的幼稚園園長回應：「小孩成長不能沒有媽媽」，甚至質疑 D「你怎麼可以跟媽媽沒有聯繫？」「你應該要跟小孩說媽媽在美國啊，在工作啊？」。

社群裡的其他爸爸問我怎麼處理這件事，我就直接開門見山跟學校說，我們家沒有媽媽這件事。然後那些爸爸就說，可是他們家那邊的學校很保守。我說，保守更要講啊，如果遇到那些不是很友善的，你就想辦法換一家。你覺得沒有怎樣對不對？然後要創造一個虛擬的媽媽出來給你小孩，然後呢？那我說，哪一年你小孩七歲的時候發現，這根本是虛擬的，他會恨你一輩子 (D)。

D 不認同對孩子編造謊言以符合異性戀雙親家庭組成形態，但是 D 尚不願向學校協商其同志家庭身份。有部分原因是訪談當時他還是單身（目前已婚），他認為並沒有向學校主動揭露的迫切必要性。而校方在面試時通常會向家長保證單親家庭與一般家庭並無不同，其子女在學校中亦不會遭差別待遇。只不過有些師長還是會理所當然地表露其異性戀中心的父母雙親思維，追問孩子母親的相關資訊，問句中不經意流露其無法想像一個家庭中缺少母親的角色。

(二) 家長與師長共同建構同志家庭認同

L 則是選擇先向兒子的幼稚園坦誠，看校方如何因應同志家庭，以避免

孩子一直被問「媽媽呢？」。L 發現大部分校方會回應單親家庭不是問題，但卻避而不談男同志家庭認同。入學後，L 主動向兒子的老師建議，如果上課內容提到媽媽的時候請以「主要照顧者」的說法取代，希望孩子對於家庭成員的想像不會困在主流家庭的性別角色窠臼。

而 T 和兒子學校老師一開始也採漸進式、心照不宣的方式互動，過了一段時間 T 主動找學校老師說明同志家庭的身份，並與老師們展開來回討論，「共同建構」他們的同志家庭認同，近似共文化理論中「借助友善中介」的溝通傾向（utilizing liaisons）（Orbe & Roberts, 2012）。

老師有跟我們談論之後可以怎麼樣去跟孩子說他身世的狀況。老師有提醒我們在家裡跟在外面，面對外人的態度要一致。我們在家裡的稱謂是「爸爸」跟「爹地」，那帶著孩子在有外人的狀況，我們也必須是爸爸跟爹地，不是變成爸爸跟「叔叔」之類的。那一天回家之後，老師也有傳訊息給我，她訊息裡面有一些他們在學校的繪本，就把它拍下來給我們看。其中就有一本叫做「家庭大不同」，就是他們在學校會給小朋友看的繪本，裡面有提到有些家庭，會是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有些家庭只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兩個爸爸、兩個媽媽，會有這樣子的繪本。讓我知道他們在學校會怎樣處理這個部分（T）。

T 認為老師們尚在摸索如何教育同志家庭的孩子，但老師們懂得跳脫性別二分，在特殊節日的時候（例如母親節）告知學生和家長，兩個爸爸也同時可以是兩個媽媽。老師們也鼓勵 T 和伴侶自然地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與其他家長互動，無需躲藏。

D 發現同婚通過之後，學校或其他行業（例如婚禮相關產業、婚紗、蜜月旅行）開始看到商機，較有性別意識的幼兒園認知到多元家庭是必然得迎接與學習的趨勢。尤其是營利幼兒園，他們傾向直接邀請同志家庭到園內分享（D 就曾經受邀），進行多元家庭的教育訓練。

（三）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L 生了小孩後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直接牽著兒子走進公司，結果女同事們非常驚訝，但是紛紛表達「有小孩是好事」。L 坦言有家庭責任感的男同

志很容易被「加分」。如過去的研究所示，子女的出現成功地減輕同志家庭缺乏正當性的質疑（曾嫻融，2013，2019；Lannutti, 2014）。不過 L 的上司在正面支持之餘還是提出了她的擔憂：

同事比較意外是有小孩子這一段，因為臺灣對 surrogate 這個概念其實是很陌生的。上司當然就是說我很勇敢啦，她覺得我很有責任感，就是爲了家庭的傳承去做了這件事情這樣子。但她也會擔心這個孩子沒有娘這件事情，然後第二個擔心他是混血兒，然後又是來自於一個這樣子的爸爸，未來會被歧視的問題。她其實也都有點到，就是她的 concern 這樣，那她就問我說我有沒有想好這些事情，那我就會把我的想法跟她溝通這樣（L）。

L 指出很多同志爸爸在找卵子時同樣有上述的擔憂，甚至因此特別找亞洲女性提供卵子。L 在訪談中提到他如何回應他人這方面的質疑：

他們覺得說你是一個同志爸爸已經可能被人家歧視了，又是個混血兒，你就更容易被人家歧視。我一開始也曾經擔心過，但是我後來自己覺得這不是一個主要的考量點。我覺得他會被歧視，其實各種各樣的理由都會被歧視，我認爲不可能讓他一輩子在一個無菌的環境。我覺得「陪伴者」這個角色反而是比較重要的，不要分它是來自於爸爸還是媽媽。我覺得這個核心就是抽離性別，陪伴不一定來自於母親或父親這樣子（L）。

L 的上司聽完他上述的回應，也只能點點頭，無法反駁。又有一回，家裡有客人造訪，L 的兒子一直在哭，他們便斷言是因為沒有媽媽的氣味和心跳來穩定孩子。Goldberg（2010）與 Goldberg & Smith（2011）指出，女同志家庭的家長也經常被質疑「沒有父親」或是「缺乏男性角色典範」來反對其養育孩子。所幸 L 很願意與外界對話（educating others）（Orbe & Roberts, 2012），他對自己花時間投注在親職實踐與陪伴深具信心，並未因他人的干擾與評斷阻礙其家庭認同的構築。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與同志家長長期、數次深度訪談，以共文化理論為框架，欲理解同志家庭面對外部社會的溝過程。研究問題聚焦探討前述三組家庭使用哪些家庭認同協商的溝通傾向？其使用該溝通傾向的結果為何？這些溝通傾向對照出共文化理論中的哪些取徑？相關的研究成果，請參見「表 3：同志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實踐」的具體整理。

表 3：同志家庭對外協商家庭認同之溝通實踐

家庭類型	女同志家長與 前異婚子女家庭	女同志家長 與人工生殖子女家庭	男同志家長 與代理孕母子女家庭
1. 常見溝通情境	職場、女同志家長線上社團、 社群媒體、鄰里、學校、公 共場合	職場、鄰里、醫院、公共場 合	學校、職場
2. 溝通傾向	(1) 社群媒體上公開同志家 庭認同 (2) 嘗試融入女同志圈內線 上群組 (3) 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 庭常態 (4) 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1) 以日常互動展現同志家 庭常態 (2) 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3) 「挑戰」異性戀中心家 庭體制	(1) 漸進式協商同志家庭型 態 (2) 家長與師長共同建構同 志家庭認同 (3) 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
3. 上述溝通傾向所得 之家庭認同協商 結果	(1, 3, 4) 有助於家庭認同協 商；(2) 較不順利	(1, 3) 有助於家庭認同協 商；(2) 端看對方是否願意 對話	(1, 3) 逐步階段性地協商家 庭認同；(2) 有助於家庭認 同協商
4. 上述溝通傾向對應 共文化理論「溝通 取徑」與「預期結 果」	(1, 2, 4) 堅定自信地順應、 (3) 非堅定自信地順應	(1) 非堅定自信地順應、 (2) 堅定自信地順應、(3) 挑釁地順應	(1) 非堅定自信地同化、 (2, 3) 堅定自信地順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該表第 4 點是指本研究歸納出之第 2 點溝通傾向與共文化理論比較後，對應表 1 所得之溝通取徑與預期結果。

如同其他採取共文化理論的實證研究，本研究致力於將該理論化框架應用於不同的社會文化實體脈絡，企圖提升研究者們對共文化溝通實踐的理解，解釋跨群體間（如：同志家庭與非同志群體）的微妙互動與溝通傾向（Razzante et al., 2021）。本研究發現，三組家庭在對外協商同志家庭認同時，多數嘗試「堅定自信」與「非堅定自信」的溝通取徑，極少數使用「挑釁」的溝通取徑，期望達到「順應」或「同化」的協商結果。根據受訪者的經驗之談，上述協商之溝通傾向並無法總是達到穩固同志家庭認同的結果，比方使用「以對話回應外界質疑」溝通傾向的結果，仍取決於溝通對象是否具備對話動機與意願，倘若缺乏此意願，則該對話傾向可能反向動搖同志家庭原

先的認同基礎（如 m）。此外，同志家長如果預期到溝通情境存在的風險越高，例如可能影響子女在校的處遇、職場晉升壓力，則越容易選擇持續觀察學校與職場的友善程度變化，再漸進式地使用不同溝通傾向來協商其同志家庭認同（如 D）。

過往的共文化理論化相關實證研究，多側重於理解不同文化情境下的溝通取徑實踐，試圖擴展共文化理論框架中多元的溝通傾向認知，以及跨群體（intergroup）間的動態交流與互動關係詮釋。直到近期 Razzante et al. (2021) 指出，結合一個「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研究視角，將能為跨文化溝通學者們提供一個更全面的立基與角度來思考文化、溝通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換言之，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在同一脈絡下，不該被簡單地化約為二選一：不是優勢的一方，即為弱勢的一方（Orbe & Razzante, 2020）。學者們應該擁抱交織性的視角來理解人們可能同時擁有的邊緣與優越處境。舉例而言，Jun et al. (2021) 採納共文化理論探討亞裔美國人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受到的仇亞歧視經驗。該研究結論指出，男性受迫者相較於女性更傾向採取「堅定自信」的溝通取徑，然而分析中卻僅只說明女性受歧視的機率為男性的三倍，致使女性較不願採取積極主動的手段來回應歧視者。可惜的是，作者們並未深入討論「性別」在此種族衝突情境中扮演的厚交織因素，而僅將性別視為一種造成溝通傾向差異的「生理變項」。事實上，女性亞裔美人相較於男性，在種族與性別交織的權力階序上位置更低，遂只能採迴避的手段來回應強勢群體。亞裔男性在仇亞的研究脈絡下，雖為弱勢群體卻也不可忽視其性別及身材體型上的權力優勢。

呼應 Razzante et al. (2021) 的提醒，本文認為以共文化理論化框架檢視研究結果時，需結合弱勢群體的「交織性」及「非典型弱勢身份原型」（non-prototypical minority）等概念綜合討論，以強化其理論化內涵。茲分述如下：

一、受訪同志家長與外界群體互動時，同時存在強勢與弱勢的厚交織認同

受訪者 m、h、D 與 T 指出，社會地位（positionality）與階級（class）深深影響其同志家庭認同協商過程與被外界接納的程度。m 提到在職場中「向下」協商家庭認同，比「向上」協商家庭認同的挑戰性來得低。換言之，

本研究中階級與社會位置較高的受訪者，如醫生與政治工作者，因具有較高的發聲位置與權力，故較能在職場上運用其優勢與賦權，在同時具備強勢群體身份（domination group identity）與弱勢群體身份的情況下，直接面對位階較低的護理師或同事協商其同志家庭認同。然而，同樣在醫院的場域脈絡，面對資深的醫師或長官，身為醫生的受訪者則失去強勢群體的優勢，在階級和非典型家庭認同上顯現為弱勢群體，於是出現向上協商的困難。

受訪家長優勢與弱勢身份在同一互動時刻交織出現的複雜生命經驗，可藉由西方學者所提出的「厚交織」（thick intersectionalities）概念進一步分析。早期的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用於理解個人身份的多重組合，如性別、性傾向、種族、階級等同時對個人造成的賦權與壓迫，致使個人可能在生活中的不同時刻具備優勢與弱勢處境（Crenshaw, 1991）。而後 Yep（2010）批評，Crenshaw 所提出的交織性理解僅凸顯刻板印象中的弱勢認同分類（如女性、性少數、有色人種、非白領），流於「條列與平板」（roster-like），容易忽略個人因不同情境脈絡，在互動行為當下所受彰顯的交織身份認同（salient identities），及其如何彼此作用後影響溝通行為（the “how” and “now”）。Yep（2013）提出「厚交織」的概念，敦促研究者更細緻地檢視個體的交織身份背景與複雜的生活經驗，在不同脈絡與時空下（the time and space）對身份認同展現與協商造成之影響。換言之，過往有關交織性的文獻多單方面聚焦在顯見的弱勢群體（oppressed groups, marked identities）之受壓迫經驗，而較少檢視弱勢群體在某些情境時空下也同時是強勢群體（dominant groups, unmarked identities）的厚交織經驗（Yep, 2016）。

厚交織的概念可協助溝通研究者深入理解特殊脈絡下，複雜的權力消長與時空運作。本研究中單一受訪者的交織身份，在目前同婚已經通過的時空氛圍下，可能在同一互動時刻，存在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認同，其對外協商同志家庭認同的溝通過程，也不能一律被視為是共文化溝通，而可參照「強勢群體理論」（dominant group theory）（Razzante & Orbe, 2018）來雙向對照檢視（Razzante et al., 2021）。不過，共文化理論與強勢群體理論目前仍僅是二分地去理解弱勢與強勢群體如何與對造溝通，未來研究者應致力於挖掘個人同時具備強勢與弱勢身份認同時刻的溝通互動理論機制。

二、受訪女同志家庭的內群體交織階序現象

本研究發現受訪女同志家庭可分為已婚、未婚，以及家長過去是否曾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家庭。筆者從 y, a, m, c, i, 及 h 的長期伴侶口中得知，僅交往過同性、未曾進入過異婚的家長，在女同志內群體中被認為「最純」，較能順利在內群體中協商其家庭認同。相對地，尚未與伴侶結婚並曾經進入過異婚、育有子女的女同志家長，在女同志內群體中較難順利獲得同儕間的網絡支持與資源分享。由此可知，不同背景的家庭成員所組成的女同志家庭互動，交織出女同志內群體中幽微的權力落差。

當我們思考同志家長的處境時，心中的原型（prototype）樣貌往往都是「順」同志性傾向，亦即未經過性傾向認同流動的兩人所組成的同志家庭，或是成長過程中從未進入過異性戀婚姻的個體所組成的家庭。卻忽視了如厚交織概念所指出的時空背景、流動的身份認同影響之下，同志家長的生命經驗與認同樣貌可能相當變動與多元。因此有一些非典型（non-prototypical）同志家長所遭遇的困境遂容易被研究者所忽略。

西方學者提出的「交織隱形」概念（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Purdie-Vaughns & Eibach, 2008）指的是非典型弱勢群體成員因自己的非原型弱勢交織身份而在社會中隱身、不被看見（unseen）。此概念挑戰了人們普遍認知弱勢群體的成員應該是全面性、均質地受到壓迫。Coles & Pasek (2020) 主張：

黑人女性所遭遇的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特殊經驗在人權運動中受到忽略……實情是，大型的社會正義與平權運動（例如，女性主義運動與反種族歧視運動）聚焦的往往是單一的身份認同框架（single specific axis）所造成的壓迫。黑人女性的交織隱形身份妨礙了她們在這些運動中，被明確看見自身的需求。交織隱形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在美國，女人（弱勢性別）的原型指的是白人女性，而黑人的原型（弱勢種族）指的是黑人男性。因此著名的黑人女性主義者（Hull et al., 1982）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所有的女人都 是白女人，所有的黑人都是黑男人。」（筆者翻譯，Coles & Pasek, 2020, p. 2）。

換句話說，非原型的弱勢群體成員（如黑人女性）所遭遇的壓迫，容易在社

會中被排除（exclusion）與消失（erasure）在女性主義性別運動與反種族歧視運動的核心關懷之外（同上引）。

在這些概念啟發下，本研究嘗試提出「交織階序隱形」的概念，亦即非原型的弱勢交織群體成員，如前述「不純」的女同志家庭，因其層層細膩、複雜、流動、非原型的交織身份，在該女同志家庭的弱勢群體中可能遭遇群體內自己人所排擠，同時群體外的人也想像不到、看不見其在內群體階層化下的「厚弱勢」處遇：亦即同樣身為女同志（家長）家庭，還有不同的階序之分，某種類型的家庭才能被稱之為「正統」，未符合正統標準的家庭則必須在某些內群體脈絡中承受被邊緣化的處境。本文並非想刻意強調哪一種女同志家庭組成最為弱勢，而是想提醒研究者們持續探究可能被隱形與忽視的非典型女同志家庭處境。

最後，回顧共文化理論化框架，強勢群體的回應與溝通過程往往能凸顯弱勢群體所遭遇的歧視現狀。本研究的三組同志家庭在受訪時不斷提及因異性戀正典所造成的汙名與溝通困境，包括前異婚汙名、性別角色混亂汙名、家庭不完整汙名。這類嚴重缺乏性別意識的錯誤觀念，使得受訪的同志家庭在協商其家庭認同時遭遇「不正當」、「不正常」的汙名與挫敗。尤其是以「小孩不能沒有媽媽」的論述，質疑受訪男同志家庭的正當性，凸顯了社會上普遍認定生理女性才適任母職的刻板觀念。此外，受訪男同志家長也強調，他們所面臨的異性戀正典挑戰，顯現在「代孕子女入籍」的程序上。T、L、D 分別指出，除了臺北市大安區以外，其他地區的戶政單位通常都會以臺灣目前不承認代孕，來婉拒處理男同志子女入籍事宜，引來男同志圈「一國多制」的不滿。目前中南部的男同志家庭若要申請代孕子女入籍，必須花一整天時間到大安區，依照前人所流傳的「教戰守則」，才有可能順利完成所有的入籍程序：先做親子鑑定，再到移民署入臺灣籍，最後回到戶政機關辦健保卡。過去不少同志爸爸曾在移民署那一關被移民官挑戰：「我怎麼知道孩子是你的？」後來才發展出先驗 DNA 的流程。

陳嘉好、余振民（2021）整理相關報導後發現，臺灣同志家庭申請收、認養的標準與異性戀家庭不同，曾有女同志家長的申請以「婚齡過短」為由被駁回，男同志家長也被要求做親子鑑定，繁瑣的程序不但耗損生父認養的時間與精神，也反映出法律對於同志家庭的保障不足。T 指出臺灣的「媽媽手冊」（寶寶手冊），亦即填寫孩子疫苗施打紀錄的文件，因為目前國內尚未通過代孕，故只能輸入「媽媽」的名字和身分證字號。這個規則忽視了以父

親為主要照顧者的家庭，是 T 認為極需要改革的體制規定。

現代多元家庭強調的是不分血緣親疏，以彈性的家庭成員組合，創造人與人間互相照顧的情感與物質生存組合（陳慧如、楊幸真，2010；彭懷真，2003）。本研究因招募到的同類型男女同志家庭較少，致使蒐集到的溝通經驗與結果較為發散，實為其限制。不過，也因為多類型的同志家庭受訪者而協助筆者聽見過去同志家庭研究未曾揭露與觀照的面向。建議未來研究可聚焦於同類家庭成員的同志家庭生命故事，並結合強勢群體理論與共文化群體理論，更加雙向地檢視性別跨群體溝通的歷程。

參考文獻

- 王晴怡 (2017)。〈同志家庭的婚權與親權之路〉，《婦研縱橫》，107：88-93。
- 王增勇 (2011)。〈跨越世代相遇：看見「老年男同志」〉，《生命教育研究》，3 (1)：169-230。
- 王慧琦、徐森杰、伊魯秀一 (2017)。〈同志收養的現況與挑戰〉，《社區發展季刊》，159：291-302。
- 何思瑩 (2014)。〈「非法」情境下的酷兒生殖－臺灣女同志的人工生殖科技實作〉，《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5：53-122。
- 余秋恩、陳逸伶、莊蕙綺、藍貝芝、簡舒培 (2007)。《女同志健康行為調查報告》。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
- 吳少喬 (2021)。〈不被學校看見的同志家庭〉，《性別平等教育季刊》，92：36-38。
- 李佩雯 (2018)。〈當「他們」也是「我們」：已出櫃同志與原生家庭之跨群體溝通關係維繫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8 (1)：65-101。
- 洪于珊 (2012)。《是拉子也是媽媽～拉媽懷孕／生養歷程及困境因應之敘說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
- 胡郁盈 (2017)。〈從「現身」到「關係」：臺灣性別社會變遷與女同志親子協商〉，《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0：107-151。
- 孫子靖、陳振豪 (2019)。〈邁向多元開放的教育環境：臺美同志家庭經驗之我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7：127-129。
- 陳嘉好、余振民 (2021)。〈同志家庭收養經驗之探討〉，《諮商與輔導》，425：33-38。
- 陳薏如、楊幸真 (2010)。〈初探女同志家庭親屬工作之運作〉，《臺灣性學學刊》，16 (2)：43-60。
- 彭懷真 (2003)。《婚姻與家庭》(修訂3版)。巨流圖書。
- 曾嫻融 (2013)。《女同志家庭親職實作》。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 (2019)。〈女同志家庭的親職照顧〉，《婦研縱橫》，110：48-59。
- 黃靖雯 (2011)。《年過半百做自己：三位中老年女同志的婚姻經驗與情慾實踐》。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彥寧 (2008)。〈往生送死、親屬倫理與同志友誼：老 T 搬家續探〉，《文化研究》，6：153-194。
- 劉安真 (2017)。〈同志伴侶關係與諮商〉，《輔導與諮商學報》，39 (1)：19-38。
- 潘琴葳 (2016)。〈同志家庭與原生家庭互動關係初探〉，《輔導季刊》，52 (2)：22-34。
- (2019)。〈打造同志家庭：女同志家長如何協助子女建立家庭認同〉，《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5：59-91。
- 謝文宜 (2006)。〈為什麼結婚：國內將婚伴侶婚姻承諾考量因素之探討〉，《中華輔導學報》，20：51-82。
- 謝文宜、曾秀雲 (2015)。〈臺灣同志伴侶的家庭圖像〉，《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1：1-54。
- 謝君臨 (2023 年 5 月 16 日)。〈立院三讀：同性婚姻者可共同收養子女〉，《自由時報》。上網日期：2023 年 6 月 7 日，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302755>
- Acosta, K. L. (2011). The language of (in) visibility: Using in-between spaces as a vehicle for empowerment in the famil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8, 883-900.
- Angrosino, M. (2008). *Doing ethnographic and observational research*. Sage.
- Baker, B. M. A. (2019). “We’re just family, you know?” Exploring the discourses of family in gay parents’ relational talk.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9(3), 213-227.
- Bashir, H., & Rohani, M. R. (2009). Theory of co-culture and co-cultural groups: Study of muslims communications in the USA. *Journal of Iranian Cultural Research*, 2(2), 97-123.
- Bie, B., & Tang, L. (2016). Chinese gay men’s coming out narratives: Connecting social relationship to co-cultural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9(4), 351-367.
- Brainer, A. (2021).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heterosexual kinship, and queer dreams: Making families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aiwan. *positions*, 29(3), 633-656.
- Breshears, D. (2010). Coming out with our children: Turning points

- facilitating lesbian parent discourse with their children about family identity. *Communication Reports*, 23(2), 79-90.
- Breshears, D., & Beer, C. L.-D. (2014)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dult children's advice for parents coming out to their children.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5(4), 231-238.
- _____. (2016). Same-Sex Parented Families' Negotiation of Minority Social Identity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GLBT Family Studies*, 12(4), 346-364.
- Breshears, D., & DiVerniero, R. (2015).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among adult children with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9(5), 573-590.
- Camara, S. K., Katznelson, A., Hildebrandt-Sterling, J., & Parker, T. (2012). Heterosexism in context: Qualitativ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co-cultural respons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312-331.
- Chen, Y. R., & Wang, P. (2010). Obstacles to LGBT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positions*, 18(2), 399-407.
- Ching, Y. (Ed.). (2010). *As normal as possibl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oles, S. M., & Pasek, J. (2020). 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 revisited: How group prototypes lead to the erasure and exclusion of Black women. *Translational Issu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4), 314-324.
- Crenshaw, K. (1991). Mapping the margins: Intersectionality, identity politics,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f color. *Stanford Law Review*, 43(6), 1241-1299.
- Decena, C. U. (2008). Tacit subject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4: 339-359.
- Dixon, J., & Dougherty, D. S. (2014). A language convergence/meaning divergence analysis: Exploring how LGBTQ and single employees manage traditional family expectations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1), 1-19.
- Friedman, S. L., & Chen, Y. C. (2021). Will marriage rights bring family equality? Law, lesbian co-mothers, and strategies of recognition in Taiwan. *positions*, 29(3), 551-579.

- Galvin, K. M. (2006). Diversity's impact on defining the family: Discourse-dependence and identity. In L. H. Turner & R. West (Eds.), *The family communication sourcebook* (pp. 3-19). Sage.
- Gates, G. J. (2015). Marriage and family: LGBT individuals and same-sex couples.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5(2), 67-87.
- Giammattei, S. V., & Green, R. J. (2012). LGBTQ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History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J. J. Bigner & J. L. Wetchler (Eds.), *Handbook of LGBT-affirmative couple and family therapy* (pp. 1-22). Routledge.
- Gianino, M., Goldberg, A., & Lewis, T. (2009). Family outings: Disclosure practices among adopted youth with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Adoption Quarterly*, 12, 205-228.
- Goldberg, A. E. (2007). Talking about family: Disclosure practices of adults raised by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8(1), 100-131.
- _____. (2010). *Lesbian and gay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Research on the family life cycl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oldberg, A. E., & Smith, J. Z. (2011). Stigma, social context, and mental health: Lesbian and gay couples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optive parenthood.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8(1), 139-150.
- Haines, K. M., Boyer, C. R., Giovanazzi, C., & Galupo, M. P. (2018). "Not a Real Family": Microaggressions Directed toward LGBTQ Famil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5(9), 1138-1151.
- Hopson, M. C., & Orbe, M. P. (2007). Playing the game: Recalling dialectical tensions for Black men in oppressiv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8(1), 69-86.
- Huisman, D. (2014). Telling a family culture: Storytelling, family identity, and cultural membership. *Interpersona*, 8(2), 144-158.
- Hull, A., Bell-Scott, P., & Smith, B. (Eds.). (1982).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 Jun, J., Woo, B., Kim, J. K., Kim, P. D., & Zhang, N. (2021). Asian Americans'

- communicative responses to COVID-19 discrimination in application of co-cultural theory.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32(3), 309-327.
- Kam, L. Y. L. (2013).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Kuvalanka, K. A., Leslie, L. A., & Radina, R. (2014). Coping with sexual stigma: Emerging adults with lesbian parents reflect on the impact of heterosexism and homophobia during their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29(2), 241-270.
- Lannutti, P. J. (2014). Families centered upon a same-sex relationship: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n the context of legally recognized same-sex marriage. In L. A. Baxter (Ed.), *Remaking "family" communicatively* (pp. 51-68). Peter Lang.
- _____. (2018). Committed, Unmarried Same-Sex Couples an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5(9), 1232-1248.
- Lee, P. W. (2006). Teaching as a co-cultural instructor in a diverse classroom. *In Transit: The LaGuardia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1(2), 25-28.
- Liu, J. P., & Ding, N. (2005).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1): 30-55.
- Moreira, L. (2018). Living lesbian relationships in Madrid: Queering life and families in times of straight living fossils. In M. Yarbrough, A. Jones, & J. DeFilippis (Eds.), *Quee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after marriage equality* (pp. 17-30). Routledge.
- Orbe, M. P. (1998a). *Constructing co-cultural theory: An explication of culture, power, and communication*. Sage.
- _____. (1998b).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traditionally muted groups: Explicating a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model. *Communication Theory*, 8(1), 1-26.
- Orbe, M. P., & Razzante, R. J. (2020). Communication is co-cultural. In A. Tyma, & A. Edwards (Eds.). *Communication is...* (pp. 3-12). Cognella.
- Orbe, M. P., & Roberts, T. L. (2012). Co-cultural theorizing: Foundations, applications & extensions.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3(4),

293-311.

- Oswald, R. F., Blume, L. B., & Marks, S. R. (2005). Decentering heteronormativity: A model for family studies. In V. L. Bengtson, A. C. Acock, K. R. Allen, P. Dilworth-Anderson, & D. M. Klein (Eds.),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y & research* (pp. 143-165). Sage.
- Purdie-Vaughns, V., & Eibach, R. P. (2008). Intersectional invisibility: The distin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multiple subordinate-group identities. *Sex Roles*, 59, 377-391.
- Razzante, R. J., & Orbe, M. P. (2018).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Conceptualizing dominant group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co-cultural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28(3), 354-375.
- Razzante, R. J., Boylorn, R. M., & Orbe, M. P. (2021). Embracing intersectionality in co-cultural and dominant group theorizing: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edagogy. *Communication Theory*, 31(2), 228-249.
- Rostosky, S. S., & Riggle, E. D. (2017). Same-sex relationships and minority stres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29-38.
- Shieh, W.-Y. (2010). Gay and lesbian couple relationship commitment in Taiwan: 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7(10), 1334-1354.
- Sue, D. W., Capodilupo, C. M., Torino, G. C., Bucceri, J. M., Holder, A. M. B., Nadal, K. L., & Esquilin, M. (2007). Racial microaggressions in everyday lif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4), 271-286.
- Yep, G. A. (2002). From homophobia and heterosexism to heteronormativity: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l of queer interventions in the university classroom. *Journal of Lesbian Studies*, 6, 163-176.
- _____. (2010). Toward the de-subjugation of racially marked knowledges in communication.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75(2), 171-175.
- _____. (2013). Queering/quaring/kauering/crippin' /transing "other bo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6(2), 118-126.

- _____. (2016). Toward thick(er) intersectionalities: Theorizing, researching, and activa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ies. In K. Sorrells, & S. Sekimoto (Eds.), *Globaliz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reader* (pp. 86-94). Sage.

本文引用格式

- 李佩雯 (2023)。〈家，是動詞：育有子女同志家庭對外家庭認同協商研究〉，
《傳播研究與實踐》，13 (2)：263-301。https://dx.doi.org/10.53106/22
2114112023071302009
- Lee, P. W. (2023). “Family” is a verb: A study on external negoti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among same-sex couples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3(2), 263-301. https://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23071302009 [Text in Chinese]

“Family” Is a Verb: A Study on External Negoti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Among Same-Sex Couples With Children

LEE, Pei-W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y adopts Mark Orbe’s co-cultural theory a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and orientations used by Taiwanese same-sex families to negotiate their family identiti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After conducting a series of long-ter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in two years with five lesbian and three gay parents of same-sex families, th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interviewed same-sex families tended to use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such as “assertive,” “non-assertive,” and “aggressive.” It is expected to achieve the results of “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 of family identity negoti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cultural communicatio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cepts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atypical prototype” of minority groups in order to become more solid and comprehensive.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ls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ick intersectionality” and “intersectional hierarchy invisibility” of the interviewed same-sex parents in shap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their family identities

Key words: intersectionality, co-cultural theory, same-sex family, family identity, identity negotiation

* E-mail: pwlee@mail.shu.edu.tw

Received: 2023.01.07; Accepted: 2023.06.02

